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藏史新考

陈楠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K281.4-53
29

藏史新考

陈楠/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史新考/陈楠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1108 - 739 - 0

I. 藏… II. 陈… III. 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K28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0447 号

藏史新考

作 者 陈 楠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热瓦迪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 数 41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739 - 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自20世纪80年代始涉足藏学领域，迄今已有25个年头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怀想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感慨良多。这几十年，是我国各方面事业大发展时期，也是我们藏学研究事业大发展时期。我生也有幸，恭逢盛世。记得1984年我刚到中央民族学院师从苏晋仁先生学习吐蕃历史时，苏先生曾说：藏学在国内是鲜学，在国外是显学。在读硕士期间，曾研读过许多国外藏学大家的学术论著，更是感触良多。藏学与敦煌学有同样的尴尬：故乡在中国，研究在国外。从那时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期待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复兴，也乐于为此奉献一点绵薄之力。今天看来，中国藏学事业已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进步，从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出等，可以说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藏学研究以往的尴尬局面，并且逐步确立了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只有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环境下，才有学术事业的发展繁荣。在国家大力投入支持下，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推出了撰修《清史》工程，在民族史方面有《西藏通史》国家重点课题等。我应邀参加了《西藏通史》课题，承担明代卷的部分撰写任务，现初稿已告完成。在《清史》课题方面，我也参加了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诸如有关清代民族历史档案翻译整理方面的审校工作，当然是很外围的一点工作。此外，我个人也承担了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和北京市社科项目《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也已如期结项。在完成上述这些课题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学术工作需要，要完成所承担的项目，同时也是自己学术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和进步的过程。在自己的一小片学术园地里，不断努力劳作，有汗水有折磨，当然也有所积累有所收获。自1998年拙著《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出版及今，又11年过去了。兹从这些年陆续发表的论著中，选录27篇勒成一帙，与前集相类，文章大多系运用藏汉文献考证藏史的史实，故名之曰《藏史新考》。

总括起来，《藏史新考》大致分为三部分内容：其一，吐蕃历史文化研究；其二，元明中央乌思藏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其三，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其中，涉关明代藏史研究的内容最多，研究也较系统和深入。

自1984年我师从苏晋仁先生、王尧先生，开始涉足藏史，就是从吐蕃史起步的。最初基本上是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吐蕃金石碑刻及敦煌汉藏文写卷等资料，研究唐蕃关系及吐蕃社会制度等内容。后来转入明代藏史研究，起因有些偶然。1994年，我应邀参加“雍和宫改庙250年学术研讨会”，主办方要求参会论文应与北京和藏传佛教关系有关，在准备论文时，涉及明代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前后花费近两年时间，每天翻阅《明实录》，用力颇多，最终撰成《大智法王考》（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颇受关注与好评，后来获得国家民委科研成果一等奖。其后一发难收，先后参与几个研究课题，指导研究生也多着眼于明代藏史研究，上承元代，下迄清代，或有涉猎。

兹收录的几篇涉关吐蕃内容的文章，除早先撰写的关于噶氏

家族的文章而外，基本上涉关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重归吐蕃史研究，我心里已期盼多时。这些年来虽教学研究工作的繁忙，但藏文学习从不敢怠惰，虽然进展很缓慢，但较比10年前，已是大有长进。几年前，因被聘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与敦煌学界同仁探讨学习机会增加很多，也觉得自己肩负某些责任。先后撰写关于藏汉鸟卜文书及P. T. 999号写卷的两篇文章，均是利用敦煌藏文写卷研究吐蕃历史文化，自认为还能在前辈及先贤的基础上做点力所能及的研究。自兹以降，拟以敦煌古藏文写卷为主要研究领域。

有明一代，共计276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明朝历代统治者在对藏区的治理和管辖方面，采取了与元、清两代完全不同的方针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广行招谕”和“多封众建”的政策。“多封众建”政策，是经历了明初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可以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肇发其端、明成祖永乐年间具备规模、明宣宗宣德年间逐步完成的一个过程。事实证明，“多封众建”政策是一个明智而有成效的方针。首先，明朝统治者没有派军队去征服广大藏区，使藏区各部得以免于战争和动乱，使社会生产及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大震动，此举对维护广大藏区各部的安定局面大有裨益。另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藏区各教派势力大小及地方政教合一势力集团的实际情况赐予封号，基本上符合当时藏区政治分散、互不统隶的客观情况。各派领袖及地方势力集团对朝廷封号基本满意，既有效维护了中央大一统的局面，亦未因厚此薄彼而产生地方纷争。当然，大封藏族僧人，优礼高僧，赏赐甚厚，确实也带来了一些国家财政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明初几十年间，完成了藏区的建政，近300年间，朝廷从未派军入藏，既无兵革之虞，又无裂土之忧。

藏区各部无不纳款披诚、遥申归顺，听命于中央王朝。之所以如此，即由于其政策符合当时中央与藏区地方的实际情况。

正确认识和评价藏传佛教高僧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亦是我多年来研究明代藏史意欲着重阐述的思想观点之一。在明代，得到朝廷封号的僧人很多，重要的有“三大法王”、“大智法王”、“五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禅师”等，不胜枚举，往返于藏区与内地之间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僧人朝贡使团，更是难以数计。正是活跃在明代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僧人，对维护几百年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佛教在藏区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僧人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和供养。在藏族历史上，举凡大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医药学家、天文历算学家、作家、诗人、戏剧家、画家、雕塑家等，几乎都是僧人。可以说，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头面人物多为僧人，同时许多地方实力集团首领本身又多为某教派领袖，即所谓政教合一的地方首领。明朝统治者正是深刻了解藏传佛教高僧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下大气力招徕高僧，给予他们荣宠的封号、丰厚的赏赐。明朝各代皇帝，大多与藏传佛教高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于是，在明代几百年间，从藏区到内地，由喇嘛僧侣们组成的大大大小小的朝贡使团络绎不绝，成为连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纷纷往来于藏区和内地，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但在客观上，藏传佛教僧人们在内地的种种活动，无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藏汉两族间的了解和友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两种文化体系的交流与融合。例如，为适应藏族僧人在内地驻锡安禅、授徒传教之需，朝廷专门在南京、北京、五台山等地修建藏式寺庙，其建筑风格、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极大地丰富

了内地的寺庙文化。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方面，更是使汉地佛教界绝响多时的密宗一脉悄然兴起，一些密教经典由藏文译成汉文，一些汉地僧人也因种种缘故改宗藏密。明代各种笔记、小说及各类公私记载中，也多有关于喇嘛僧人事迹的记录。所有这些，都从各个层面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内地对藏文化的了解，其部分精华内容也程度不同地融进了内地的汉文化。与此同时，广博丰厚的汉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在藏族社会发展史上，与唐朝相对应的吐蕃时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很大成分上是受了唐文化的影响；另一个时期就是15—17世纪，而其中重要因素就是受到明代内地汉文化的影响。

有关明代大慈法王的研究，是我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课题研究之一。此项研究通过连缀组织零星散碎的藏汉文献资料，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系统、完整的透视和阐述。总括起来，大慈法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宗喀巴的近侍弟子，他侍奉宗喀巴30年，他跟随师尊参与了格鲁派创建前后一系列的宗教与社会活动，而且亲自主持修建格鲁派第三大寺院色拉寺；作为一个格鲁派僧人，他勤学苦修，不仅精通格鲁教派的显教经典义理，更是擅长格鲁派的密法仪轨；作为一个应诏入朝的藏传佛教高僧，他谨遵师命，不辱使命，两次领受封号，多次入贡，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皇帝，特别是与明成祖和宣宗皇帝关系密切，对维护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特别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一个最早来到内地的格鲁派高僧，他恪尽僧人本分，随处教化，在南京、北京、五台山及青海、甘肃等地区都留下了弘法传教的印迹，为格鲁派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客观上对藏汉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藏汉民族的团结友谊作出了贡献。

我本不研究清史。但长期以来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的教学工作，系统性与完整性是必须的，不像单纯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切一个断面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有人问我研究藏史具体方向时，我说主要侧重吐蕃和明代西藏历史，但教学则是从“卡若文化”到“青藏铁路”了。但人的能力终究很有限，这里所收的有关清代的内容，是我具体参与涉关清代治藏政策的一个课题的收获。所探讨的内容不是历史个案与专题考证性研究，是从历史宏观视角，通过对清代治藏政策具体措施等背景内容的分析论述，了解和梳理清代西藏民族宗教政策与明代治藏政策的关联、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主要特色、如何评价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利弊得失等。

清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定都北京时，西藏及全国藏族地区已尽在蒙古和硕特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早在1637年（崇德二年）即已归附清朝，因此，自入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世祖福临（顺治帝），已经实际上通过蒙古和硕特部实现了对全国藏族地区的间接统治。清朝注意吸取了元明两代治理藏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因势利导，灵活变通，在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治理与管辖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清朝继承并发扬了元明两代尊崇藏传佛教、优礼喇嘛高僧的传统，而采取了扶植藏传佛教后起之秀格鲁派（黄教）的宗教政策，使之成为帮助清朝安辑蒙藏地方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其次，在行政管理方面，清朝中央政权从西藏及全国藏族地区实际出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利用蒙古和硕特汗王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的第一阶段；利用西藏地方贵族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的第二阶段；以及中央在西藏设置钦差大臣衙门、完善各项制度，最终使清朝在西藏地区施政臻于高峰的第三阶段。清朝统

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既避免急躁冒进，又能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施政。

学无止境，在广阔的藏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等待开辟和拓展的园地。这部《藏史新考》的结集，固然是对以往教学和研究工作阶段性成果的一次总结，但我更愿将其看做自己学术探求之路上的新起点。

目 录

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

——P. T. 1045 号、P. 3988 号与 P. 3479 号文书解析 …… (1)

唐蕃之间佛教文化交往关系考述 …… (40)

《金光明经》及其汉藏译本源流考述 …… (59)

P. T. 999 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

——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正与考辨 …… (76)

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吐蕃的内政建设及唐蕃关系 …… (98)

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 …… (121)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 (137)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 (159)

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论 …… (185)

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 …… (206)

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 …… (222)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与蔡巴噶举关系详考 …… (242)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 …… (257)

明成祖朱棣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 (273)

释迦也失主持修建色拉寺史事考述 …… (294)

明代乌思藏“五教王”考	(315)
藏传佛教格鲁派佛学思想探源	(340)
法渊寺与明代番汉经厂杂考	(356)
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	(369)
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长卷》译释	(385)
明代乌思藏驿站交通及汉藏经济交流	(415)
清初利用蒙古汗王之治藏政策	(434)
清初西藏地方管理体制之嬗变	(444)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与驻藏大臣及驻防制度	(459)
清代前期治藏宗教政策探析	(474)
清末治藏政策的沿续与变化	(494)
清代其他藏区民族与宗教政策概况	(503)
后记	(513)

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

——P. T. 1045 号、P. 3988 号与

P. 3479 号文书解析

一、相关研究概述

在 20 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关于吐蕃占卜的内容很多，比较著名的写卷有 P. T. 55、P. T. 129、P. T. 351、P. T. 1043、P. T. 1045、P. T. 1046、P. T. 1047、P. T. 1051、P. T. 1055 以及 Vol. 55、fol. 6^①等。

P. T. 1045 号藏文卷子是以“乌鸦叫声来判断吉凶”的文书，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诗歌体，共 12 行，29 节。其内容大意是：乌鸦是一种能传达神的旨意的神鸟，它在不同时间、不同方位、不同声音的叫声分别代表了不同意义的前兆，而人们对这种能传达神意的神鸟务要虔诚恭敬，务要及时向它供奉“多玛”（施食），这样才能趋吉避凶。第二部分以横向 9 个方位、纵向 10 个不同时间段乌鸦叫声所代表的 90 种不同含义的占卜表格，另外还特别注明每个方位所应供施的“多玛”种类名称。

该文书被法国伯希和氏劫运巴黎后，藏于法国国家巴黎图书

^① Vol. 55、fol. 6 号占卜文书，系英国托马斯（F. W. Thomas）《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Ancient Folk - Literature from North - Eastern Tibet, Berlin, 1957）一书编译的六篇敦煌古藏文卷子的第六部分。国内的研究参见王尧、陈践：《三探吐蕃卜辞》，载《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

馆东方手稿部。很快这份十分完整、内容丰富无比的古藏文文书即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是最早被解读研究的古藏文写卷之一。自20世纪初以来，已有许多前辈学者对吐蕃鸟卜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主要有：

(1) 巴考的研究：1913年，法国最早的藏学家巴考（J. Bacot, 1890—1967）率先以《雷电预兆一览表》为题，刊布该文书的藏文及其对该文书的解读和译文。^① 巴考是藏文教授，他本人具备丰富的藏文知识，但他独立译解这份9世纪以前的古藏文写卷难度还是太大了，他在译解时求助于一位名叫丹巴杜登的藏族僧人学者的帮助。客观地说，9世纪的占卜文书对于一个20世纪的喇嘛僧人来说，无论从文字还是内容都是十分陌生的，而且，“从思想上他们是看不起这一类作品的，甚至怀疑它们的真正价值。”^② 巴考的研究最大功绩是他首次刊布了这份藏文文书，但他同时也犯了两个非常大的错误：其一，他在释文中把序言与表格截然分开，认为是不相干的两个部分；其二，从他的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到谬见，他将乌鸦的叫声译解为“雷电”。

(2) 劳费尔的研究：1914年，当时著名的中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美籍德国人劳费尔（B. Laufer, 1874—1934）在《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吐蕃的鸟卜》^③，其副标题为：“伯希和藏文写卷第3530号的诠释及9世纪藏语语音学研究”。这个3530号是伯希和临时登录之号，藏入法国国家巴黎图书馆后由拉露女士

① [法] 巴考：《雷电预兆一览表》，载《亚细亚学报》第2套第1卷，1913年，第345—349页。

②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③ B.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oung Pao, XV, 1, 1914, pp. 1—166.

编号为 1045 号。劳费尔知识渊博，对藏语及多种中亚语言都有研究。他在论文中重译了这份古藏文占卜文书，同时纠正了巴考所犯下的错误：其一，说明这一文书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序言，是一个概括的说明；第二部分为占卜表，是利用乌鸦叫声占卜的具体例证。其二，纠正了巴考的“雷电”说，准确指出是以乌鸦的叫声、时间和方位来判别吉凶。另外，劳氏文章中所涉及的关于“9 世纪藏语语音学研究”对后来唐蕃汉藏对音研究开了先河。最典型的例证：《新唐书·吐蕃传》中提到吐蕃官号总曰“尚论掣逋突瞿”究竟是何意，令许多研究者莫知所云，一头雾水。劳氏以他广博的语言学知识一锤定音：“尚论掣逋突瞿”即为藏文 Zhang blon chen po dgu 之音译，王尧先生提起这个对音，每每拍案叫绝，称之为“天衣无缝”。找到了对音，意思也便一目了然：“尚论掣逋突瞿”即是“九大尚论”。

劳费尔的研究纠正了巴考的错误，但对于吐蕃鸟卜文书的译解还存在一些疑问之处。劳氏以大量篇幅讨论吐蕃乌鸦占卜术的起源问题，试图说明它与印度占卜术的渊源关系，在今天看来，其中许多讨论和见解是不着边际的。

(3) 茅甘的研究：1987 年，法国学者茅甘 (C. Morgan) 在巴黎《远东亚细丛刊》上发表《敦煌汉藏文写本中乌鸣吉凶吉书》一文，在劳费尔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对 P. 3988 和 P. 3479 两份有关鸟卜内容的敦煌汉文写卷的解析和研究。应该说，茅甘将汉藏文敦煌鸟卜文书所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她试图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种占卜术的起源问题，是否可以像劳费尔所希望的那样，认为根据乌鸣所作的占卜是起源于印度，其后又被吐蕃人使用和修改过的一种方法呢？或者是汉文新史料是否可以允许我们考虑这是吐蕃对汉族地

区的一种借鉴呢？或者是指一种经汉化的印度——吐蕃方法呢？”^①但茅甘女士的研究也留下遗憾，因为她本人不是藏学家，她是在石泰安和今枝由郎两位先生的帮助下才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的，她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对藏文和汉文的时间术语进行对照和比较研究，虽然她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也颇有研究，但对于厚重的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背景毕竟了解有限。因而，她初衷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也不得不以问号形式结束。

(4) 王尧先生的研究：国内藏学界对敦煌古藏文写卷的研究无疑应首推王尧与陈践两位先生，正是由于他们对一批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译解和介绍，才使得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今天的初步进展。王尧先生对占卜文书十分关注，曾先后撰写多篇文章对吐蕃时期的占卜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王尧先生的《吐蕃的鸟卜研究——P. T. 1045 号卷子译解》写于 1986 年，他曾说：“过去，只有巴高、劳费尔等少数几位讨论并发表了《吐蕃的鸟卜》专文（1914 年《通报》），后来就无人问津，形成绝唱。”^②而王尧、陈践二位先生 70 年后对吐蕃鸟卜的研究，不仅成为继巴氏、劳氏之后的嗣响，同时也开创了国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藏族古代文化史之先河。王、陈二位先生的研究和贡献：首先是第一次将 P. T. 1045 卷子译成汉文，同时介绍了巴考和劳佛尔对该文书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藏文化中关于鸟卜渊源作了进一步探讨。

笔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与赵炳昌先生合作将劳氏《吐蕃

① [法] 茅甘著，金昌文译：《敦煌汉文写本中鸟鸣吉凶吉书》，载耿昇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8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53 页。

②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5 页。

的鸟卜》译成汉文^①，虽对 P. T. 1045 卷子亦有浓厚兴趣，但当时尚不具备进一步研究的能力。今天笔者不揣浅陋，希望将这一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 P. T. 1045 号藏文写卷及 P. 3988 号和 P. 3479 两份汉文写卷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一）重新解读 P. T. 1045 号藏文卷子，提供新的译文并附藏文转写；（二）重新迻录并释解 P. 3988 号和 P. 3479 号两份汉文卷子，纠正茅甘原释解中的某些错误之处；（三）比较藏、汉两种文书中异同内容并试图深入探讨汉藏文化交流之渊源关系。

二、P. T. 1045 号写卷《乌鸣占卜表》译解

（一）序言

- 1 乌鸦本是人怙主，
- 2 尊神派遣到地方。
- 3 羌塘草原牦牛肉，
- 4 天神使者好祭享。
- 5 叫声传达尊神旨，
- 6 八面上空九方向。
- 7 三种叫声表神意，
- 8 祭品多玛快奉上，
- 9 神鸟乌鸦享用光，
- 10 如祭尊神一个样。
- 11 乌鸣并非尽前兆，

^①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